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0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当代价值和意义^①

——兼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法论思考

吴志娟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种关系的战略思考和哲学逻辑。这些极富前瞻性、革命性的重要思想以及蕴涵的科学方法论对当前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间、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唯物辩证法;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012-05

Contemporar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Discussion about the Methodology for Building a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WU Zhi-ju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of Polytechnic,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has provided strategic thought and philosophical logic for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en facing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i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These foresighted perspectives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s as well as the methodology is of guiding value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governments, especially that of central-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s.

Key words: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s; contemporary value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篇章。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归纳总结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鲜明地论证了正确解决这十大矛盾的战略思考和哲学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从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说,《论十大关系》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智慧和方法论意义,它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超越了时空界限。

1 《论十大关系》一文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头7年的实践活动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

① 收稿日期:2014-04-0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高级访问学者计划资助项目(2013 FX014)

作者简介:吴志娟(1971-),女,江苏江都人,副教授,南京大学2013年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素材,也催生了理论创新的要求。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由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究竟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行得通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毛泽东和党中央只有从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因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433}。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是,我国在苏联帮助下经济建设成就喜人,远远超过旧中国上百年。但是,另一方面,学习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逐渐显现,社会主义建设明显“缺乏创造力,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出现了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只有及时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特殊性,才有可能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调查研究是获得全面、丰富、系统的实践素材的最好方法和途径,为此,毛泽东不辞辛劳,开始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他在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后,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成果。

《论十大关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破除苏联模式迷信的过程中产生的。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基本经验,对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经验的学习,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必须坚持学习借鉴的批判态度。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事件不仅在苏联和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也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深刻思考。秘密报告虽然充满了诋毁与攻击,但也客观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警醒人们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认识到,如同革命道路不能照搬苏联那样,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不能照搬苏联。“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2]143}由此,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论十大关系》就是探索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成果,通篇贯穿着以苏联经验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精神。

2 《论十大关系》蕴涵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121}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全部的哲学研究活动都立足于中国实际,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融为一体。实践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论十大关系》便是毛泽东的实践哲学的成果。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观察、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这一基本矛盾在各方面的展开。

2.1 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运动的特殊性

毛泽东十分重视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在准确把握重点的基础上辩证看待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为了突出重点,必须向重点的对立面——非重点用力的方法,为解决重点创造必要条件。

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运动的内在动力。任何矛盾着的事物,都有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同一矛盾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分。要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就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4]322} 因此,抓住重点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关键。毛泽东在分析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同时强调,“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对非重点的重视,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他们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了实践上的严重后果,“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对现实国情的把握。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人口众多,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关系重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把处于非重点地位的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加重一点,结果会怎样呢?“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据此,毛泽东风趣地提出“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关键就在于是否学会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如果“假想”,那就用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资的办法发展重工业;如果“真想”,那就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了两种方法带来的鲜明后果,如果用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会使重工

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几十年后要算总账;如果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或多或少地应验了毛泽东当年的预见。同理,在分析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时,毛泽东强调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分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时,毛泽东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用加强经济建设的办法加强国防。可见为了解决主要矛盾,同样需要花力气去解决次要矛盾。

2.2 毛泽东十分重视矛盾诸方面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十分重视分析事物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在正确区分矛盾不同性质和情况的基础上,突出同一性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把“兼顾”原则提高为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一个普遍性原则。

列宁曾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5]281-282}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因此,“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4]337}具体来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对立的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相互排斥,只能用削弱、打击、消灭对方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其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提倡斗争,以消灭敌人作为最终目的。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矛盾诸方面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不需要也不应该用消灭一方来发展另一方,只能用扶持、帮助对方的发展来发展自己。其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提倡统一,以兼顾各方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总之,对于矛盾呈非对抗性的事物来说,它的发展,不在于矛盾各方的斗争,而在于矛盾各方的协调、配合,如果求得了恰当的比例,作出了妥善的安排,矛盾的各方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正确使用兼顾原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必然要求。因此,在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做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在分析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在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

2.3 毛泽东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在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点论、两分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优点和缺点两方面,因此,应该有勇气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同时,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最后,在论及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时,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观点,辩证地认为,“一穷二白”既是缺点又是优点,满怀豪情地指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关于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重要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没有得到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但其蕴涵的战略眼光和开放胸襟却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它同时也为此后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来源和依据。

综上所述,毛泽东充分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活动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这篇文章的重要思想及科学方法论,对于正确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重大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正确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它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战略高度,是对政治改革的新定位和新要求,标志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迈向“国家治理”时代。只有顺应现代政治变革的要求,从理论上厘清几个方面的关系,才能为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整体性创新提供科学依据。

3.1 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不可否认,政府、市场与社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三种力量,它们之间的相互角逐维系了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内在张力。但是,政府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政府治理的效率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成效。也就是说,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矛盾运动中,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市场

治理和社会治理处于非重点地位。依据对立统一法则,为了更好地突出重点,有时需要向它的对立面——非重点用力,即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逻辑关系中,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政府主动放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培育并发展了市场和市场体制。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平等自由和遵从法治的经济,市场经济按照自身的扩展逻辑派生出一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相对自主的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的运行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而政府始终延续着驾驭市场的治理模式,迷信各种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能够带来的短期化效果,打破了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自由竞争的体制,市场行为显露出极端的短期化、功利化倾向。更可怕的是政府超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渗入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引发了权力寻租现象,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引发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系列冲突。追根溯源,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症结集中到“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适时对市场作用的定位作出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观点,从理论上科学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对于政府来说,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运用公共资源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弥补市场失灵。对于市场来说,它在配置资源的领域起决定作用,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市场为政府缴纳税收、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有效规范和压缩政府权力的滥用和错位,为政府权力在相对有限的职责范围内高效运转提供可能。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互动关系,既保障市场健康持续发展,又保障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对矛盾,国家来源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控制着社会,实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社会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共同体,社会与人类共存,只要人类存在,社会就会存在,而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将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逐步消亡。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消亡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还政于民的过程,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因此,从“统治”走向“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政治活动重心的转移预示着政府(现实的国家代表)与社会的关系将逐步由对立走向统一。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培育 and 催生出一个社会生活的自主性空间以及公民社会的雏形,公民个体逐渐从没有任何意义的国家机器附属物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自主意志的社会行为个体,他们通过集群的方式,或者自愿结成的组织向政府部门进行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利益诉求。人性的觉醒和人的现代性成长挑战着政府的治理权威,国家与他们的关系不再单纯是命令服从的关系,“而是被注入越来越多的平等契约的关系属性,嵌入了日益丰富的讨价还价的理性博弈的内容。”^[6]在社会转型、矛盾激增,治理风险增大的情况下,传统的政府管制社会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建立新型的官民合作的治理模式呼之欲出。官民合作的治理模式将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认社会相对的自主性生长空间。有效的政府治理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政府需要转变观念,放低身段,以亲民友善的姿态、开放包容的胸襟,与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开展协商、合作甚至妥协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在社会公共权力的运行上,政府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逐步扩大公民渐进有序的民主参与力度,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好地防治腐败和澄清吏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上,培育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自律精神,政府着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协作。

总之,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市场和社会显现出的越来越重要的治理功能,最大限度地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通过有效的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去规范和压缩政府权力,保障政府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高效廉洁地履行自身职责,从而缓解政府治理压力,以共同应对国家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现象,最终通过政府角色和管理方式的现代转型推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从政府的一元主体的单向强制性治理模式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的治理模式。

3.2 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处理好政府间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层级政府之间,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问题一直处于十分复

杂的矛盾运动中,它们之间常常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斗争,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整个行政体制运行的综合效率。如何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协调在一个合理的框架范围内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广大、国情复杂,自古以来实行的都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等级制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在发挥出中央权力超强的掌控能力时,极容易压抑地方的积极性。因为,国家治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区域性社会事务时因缺乏相应的自主权而缺少动力,导致中央政府不堪重负;而一旦中央放权,赋予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权后,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因此,行政权力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困境。对此,毛泽东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辩证指出,要以苏为鉴,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保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允许地方有相对的独立性。既要有中央的统一,也要有统一下的地方独立性,这种辩证思维实质上构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动态调适的基本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中央进行了持续性的放权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制度创新是分税制改革。在这种分权化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从纵向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逐步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地方政府开始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权和财力,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行政目标的自主意志和现实能力。地方不再仅仅是中央政令的执行组织,而且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这种央地间的动态博弈实践同样存在中央政令不畅和地方自主权太小的矛盾。究其原因,中央的持续放权只是政策性放权,中央随时可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由于缺乏明晰、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得不到真正保障。

显然中央与地方之间不稳定、不成型的行政关系造成了央地间的负性博弈,弱化了国家治理的整体绩效。为了提高国家治理绩效,必须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合理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在实践中磨合、调适政府间合理的职责权限分工体系,通过一系列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构建纵向的和横向的政府间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

3.3 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处理好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

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始终存在着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能够发展?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当前,加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已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治革新的主要趋势。他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有一些失败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毕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三四百年,他们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严格规范的政府、具有自治和自律精神的公民以及较为完善的公民社会,这些为我们发展市场、规范政府、协调央地关系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有益经验。只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尝试。事实上,我们已经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若干先进经验,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7],这些制度已越来越为中国百姓所熟知,并越来越广泛地体现出政府治理的成效。

总之,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和胸襟,认清世界发展潮流,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把它们植根于中国大地,为中国的政治革新服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5] 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6] 何显明.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J].浙江社会科学,2013(6):4-13.
- [7]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5-8.

(责任编辑 王小飞)